

惠通桥，改写中国抗战史

本报记者 余颖

研究滇西抗战史的专家常讨论两个问题：如果1942年中国军队没有炸断惠通桥，日寇会不会真的在10日内拿下昆明、直扑重庆？如果1944年滇西反攻时中国军队没能抢修惠通桥，松山会不会继续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钉子，让收复国土的过程更加漫长？

历史无法假设，但学界公认，惠通桥改写了中国抗战的历史。



1944年7月8日，卫立煌将军视察怒江西岸后返回。（资料照片）

12点多，我刚过惠通桥，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回头望去，江面上腾空而起几丈高的水柱，惠通桥消失在浓烟之中，车辆、人流纷纷落入江水，很多人被激烈的水柱压翻下去再也没有起来。”罗开瑚劫后余生，庆幸不已。

危险并没有过去。惠通桥炸毁后，日军第56师团的坦克、卡车仍沿滇缅公路源源不断涌来，在峡谷中排起长龙，并准备搭浮桥强渡怒江。关键时刻，机头画着鲨鱼大嘴的飞机呼啸而来——“飞虎队”P40战斗机及时赶到。

据滇西抗战史专家戈叔亚研究，赶到的是飞虎队王牌飞行员泰克斯·希尔。他往下以60度角加速俯冲，向公路上的日军投下了巨型炸弹，炸跨了山崖，直接堵塞了滇缅公路。希尔和战友从空中给日军造成巨大杀伤，绵延的车队成了活靶子，日军伤亡惨重，无力组织过江，惠通桥度过了危急时刻。

从此，日军被阻在怒江西侧长达两年，始终未能越过怒江天堑，日寇“三个月内会师昆明，直捣重庆”的野心就此破灭。

一群搏命的英雄

1939年至1942年间，南侨机工成功抢运了50多万吨军需物资和15000多辆汽车，占当时国际援华物资总量的90%以上

炸断的惠通桥把日军阻挡在了怒江西岸，也把300多名来不及过江的南侨机工留在了日占区。

在中国抗战史上，南侨机工是一群为了祖国连命都不要的英雄，也是一群曾经被遗忘的抗战者。

抗战期间，滇缅公路是中国唯一的陆上物资生命线。由于当时国内缺乏汽车驾驶人员，1939年，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号召华侨青年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服务。公告得到了3192名爱国华侨青年的积极响应，其中有司机、工人，也有工程师、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只是为了报效概念中的祖国就毅然放弃了喝咖啡、吃面包的生活，投入到抗战的硝烟中。

回国后，他们组成了二战中最大的运输车队，抢运物资。当年的滇缅公路路面狭窄，经常塌方，不少机工们连人带车坠入山谷，连



一道难越的天堑

惠通桥炸毁后，日军被阻在怒江西侧长达两年，日寇“三个月内会师昆明，直捣重庆”的野心就此破灭

水泥桥塔，斜拉钢索，桥面不足5米宽，如果没有桥头那块“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惠通桥看起来跟西南山区那些过河桥没什么不同。如果非要说不一样，那就是惠通桥西头还保留着一座一人多高的碉堡。

“惠通桥西岸可达缅甸，东岸可达昆明。当年，日军就是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对惠通桥发起了攻击。”站在墙壁斑驳的碉堡前，龙陵县委宣传部部长董斯璇讲述起70多年前的故事。

1939年，中国抗战进入最黑暗的时刻，国土大面积沦陷。中国所有的国际通道几乎被日军封锁殆尽，只剩下偏居大西南的一条滇缅公路，成了外国援助中国战略物资进来的唯一“输血”通道。

原建于明代的惠通桥就是这条通道上的咽喉。1935年，新加坡华侨梁金山慷慨捐资，将旧桥改建为新式柔型钢索大吊桥。新桥落成那天，梁金山还运来一头大象踩桥，让周边村民兴奋了好几个月。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条长仅205米的惠通桥会在数年后成为援华物资通道的关键节点，并决定一场战争的走向。

抗战开始后，惠通桥就不曾太平过。1940年10月至1942年2月，日军为破坏滇缅公路运输，曾先后出动飞机168架次，对惠通桥进行了6次空袭，每次都使桥梁部分受损，负承载力下降，最终每次只能通行一辆载重7.5吨的汽车。

1942年正是滇西抗战的紧要关头。5月3日，中缅边境要地畹町失守，云南遮放、芒市、龙陵等地被日军占领，中国远征军被迫撤离。当时的一份美军侦察机报告中写道：“滇缅路上中国军队零零落落，溃不成军，对于日军的前进完全没有抵抗，如果再不设法挽救，大约10天左右日军就可到达昆明了。”而昆明紧邻陪都重庆。果真如此，则中国危矣。

远征军在撤退中炸掉了通过的每座桥梁，怒江上仅剩下惠通桥连接两岸。5月2日，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从畹町撤往昆明，途经惠通桥，给大桥留下一队宪兵和工兵，并授权宪兵队长张祖武接管大桥，一旦情况紧急立即炸桥。张祖武立即率领几十个士兵将炸药埋在桥上，做好了炸桥的一切准备工作。

5月3日、4日，隶属日本“南方军”第15军的机械化部队第56师团坂口支队3000多人到达离惠通桥40余里的松山一带，因为担心中国人毁桥死守怒江天险，决定隐蔽奇袭，得手后再闪击猛进。

5日上午，日军伪装成难民来到了惠通桥头。此时的惠通桥西岸车马络绎不绝，散兵难民混杂抢行，商车军车推拥争道，人心惶惶，乱哄哄，张祖武正率领手下勉力疏通。混乱中，士兵开枪以维持过桥秩序。

枪声一响，混在逃难人群中的日军便衣以为自己被发现了，于是举枪射击开枪者，试图占领桥梁。在一片突如其来的枪声中，张祖武下令炸桥。

那一声巨响，令如今97岁的南侨机工罗开瑚记忆犹新。炸桥那天，他正开着车往惠通桥赶，沿途听到了要炸桥的消息。他一路急行，即使遇到堵车也不下车休息。“中午

在南京工作多年，常从下关到江东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段路走过，江水拍岸，潮打金陵，激荡着古都南京历史上悲壮的一幕一幕。

2014年，国家把南京大屠杀纪念日——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这是第一次以国家的形式纪念在这场浩劫中遇难的三十万平民。关注历史进程中平民的悲喜哀伤，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人类的进步。在2015年的公祭之日前，记者又来到江东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再一次真实地触摸那不能忘却的伤痕。

因公祭准备工作，纪念馆临时闭馆。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下午4点，记者从3号侧门走进纪念馆。穿过一条窄窄过道，眼前是一大片遍布鹅卵石的空旷集会广场。南京又名“石城”，石头是南京的象征。工作人员告诉我，整个广场用黑色的脊背石铺地，意在营造一个没有生命的空间，累累卵石喻义在劫难中丧生的同胞们的“累累白骨”。

国家公祭日前夕探访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触碰历史的伤痛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除了少数几个工作人员在勘测布点外，巨大的广场几乎没有人，几十米长“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黑白白字背板已经搭建起来，在夕阳的余晖中，更添苍凉与肃穆。置身广场中间，马路上的喧嚣、汽笛都成了隐隐的背景，让人一下子感受到历史疼痛的脉动。

站在史料陈列馆的台阶上，两边是大块坍塌城墙石，透过台阶层层隐隐的火光，扭曲的城墙门洞上模糊可见“中山门”字样，走下去，仿佛“走进深渊”，在片刻迟疑、停滞，我迈步向下。

走过“中山门”，一片开阔的祭台，右侧的黑墙刻满了死难者名字，在一片跳跃烛火中，“300000”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刃，让人透不过气来，展厅里一片寂静，只有我小心翼翼的脚步，一面照片墙扑面而来，一张张模糊又清晰的脸，不忍卒视。

展厅第二部分开始，以图文、影像、实物形式详实讲述那段历史发生、发展、结束。抗争、挣扎、屠杀、逃亡、营救、审判，历历在目，大到屠杀的机枪、长刀，小到死难者的纽扣、鞋垫、搪瓷杯都在默默地控诉惨绝人寰的血腥。

民国的平民房，断壁残垣，幸存者夏淑琴透过墙上液晶电视告诉我，这里曾经发生的劫难。

透过易安华将军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我看到“血战光华门”惨烈，78年的风烟之后，一张张血污勇敢的脸上还是满满的不屈和抗争。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这场中国人的浩劫之中，来自异域的明妮·魏特琳女士就是这样的人，约翰·拉贝先生也是这样的人。

人类黑暗长河，总有若有若无的光辉指引着人们前行，他们就是这样的光辉，在满目疮痍中，我看到勇士的身影，他们有牧师约翰·马吉，安全区副总书记乔治·费奇、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

魏特琳女士去世了，从她墓地采摘来的松子放置在展柜里，让每一个前来的中国人瞻仰，对于这样一个帮助近万名中国人渡过劫难伟大女性来说，我们找不到更好的纪念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感激与怀想。

在展厅最后，我看到了张纯如女士的铜像。当岁月的风尘快要使伤痛记忆淹没时，张纯如女士以她如椽之笔还原真相，提醒国人，警醒国际社会，人类历史上沉重一页，决不能以轻松的方式翻篇。

魏特琳女士回到美国后，不堪伤痛记忆的重负，自杀身亡。无独有偶，张纯如女士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后，也在36岁大好年华结束了生命。为什么会这样？

走出陈列馆已是下午5点，暮云四合。集会广场的北侧一段城墙下，巨大滴血头颅更显狰狞，撑起绿松树的竟是一条分不清是手臂还是小腿的残肢，站在历史的铜版路上，看着卷着裤腿，露出伤残变形小腿的老妪。我不禁深思，死者已死矣，但痛苦并没有与死难者一起埋葬，除了累累的白骨，这段历史还留下无尽伤痛，找到伤口，却又无处不在，它还流着脓，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伤。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70年前，拉贝先生就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发人深省的句子。

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70年过去了，当日本政府还在为当年罪行“遮遮掩掩”时，我重新回味勇士们的真知灼见。如果不能对伤口进行清理，伤痕永远不能愈合。中国人是这样，日本人也是这样。



一首不屈的战歌

中国军队兵员和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惠通桥运往滇西战区，加速了中国远征军胜利和日军覆灭的进程

为了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惠通桥正在进行翻修。锈红的钢索拉着吊桥，晃悠悠，像一道弧线扎入了对岸的绿树丛中，把桥塔上的红五星衬得格外显眼。这已经是多次大修后的样子了。

惠通桥最著名的一次大修发生在1944年。此时日寇颓势已现，中国远征军准备向盘踞滇西的日军发起反击。

桥下的怒江水看似平静，实则深不可测、水流湍急。修桥的工人告诉记者，老辈人都说，当年日军的坦克掉下去，连个泡都不冒就沉底了。因此，1944年5月11日，中国军队为进攻松山，不得不强渡怒江，实在是无奈之举。所幸当时日军已经收缩在松山附近，怒江沿线几乎没有布防，当天渡江十分顺利。只有一名叫邓超的士兵，因为担心横在江上的钢索刮倒同伴，好心前去推扶，不料水流湍急，不慎失足落水牺牲。

6月4日，松山战役打响。这场战役远比预想的要艰苦，原计划一个团、数日之内就能拿下的松山最终打了近百天，中国军队先后投入兵力近6万人。要继续增运军火物资和兵员支援前线，就必须修复惠通桥。

6月18日，国民政府桥渡工程处在原桥处抢修人行便道，同时修建东西两岸码头，为修复吊桥做准备。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老照片珍藏着一张老照片，是1944年7月8日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和美军哈里·凯恩上尉走过刚刚抢通的惠通桥时拍摄的。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因东岸被炸毁的桥塔还未恢复，此时的桥面仅3根钢索承重。上面铺着木板，连护栏都没有，承载力仅供人行，车辆无法通过。即便如此，惠通桥也在发挥作用，大量的武器、弹药以人背马驮的方式，由此运上松山前线。

8月1日，为了支援战事胶着的松山战役，中国军队突击修复吊桥：东岸被毁桥塔用木樑代替，钢缆、纵横梁全部更新，直到8月18日才竣工。

惠通桥刚于18日恢复通车，日军就两次派出飞机轰炸。但此时中方防空力量已经加强，日机并未损伤吊桥，仅炸毁过江钢索1根，炸死桥技工1人。自此以后，日军在滇西战场节节败退，再也无力空袭惠通桥。中国军队兵员和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惠通桥运往滇西战区，加速了中国远征军的胜利和日军的覆灭进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个月惠通桥也修复完成，继续保证怒江东西两岸通行，一直到1974年下游400米处的“红旗桥”建成后，惠通桥才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不再是交通要道，但今天的惠通桥就像一位沉默的老兵，尽管换上了笔挺的新装，骨子里却依然萦绕着不屈的战魂。



为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惠通桥正在进行翻修。 余颖/摄

感国运变化 发时代先声

本报记者 李万祥

解历史，了解一代又一代人为什么前仆后继，从情感上成为真正的中国人。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从投身革命、参加抗日战争保家卫国，到贴近人民、积极为时代鼓与呼，无数文艺工作者勇担书写时代、讴歌人民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用一腔热忱、饱含无限爱国激情的笔墨，用鼓舞士气、充满时代精神的旋律，用张扬个性、独具舞台张力的艺术表现方式，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之中。

通过对抗日救亡歌曲创作旋律、思想内容、社会作用的梳理，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孟卫东指出，抗日救亡歌曲和时代、社会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人民之间的天然的、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

而如今，隆重而又丰富的纪念活动有力拉近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在重新审视和发现历史的同时，抗战题材和文艺创作再次被拉到文艺舞台的中心，接受人们的审视、品评，并被给予新的期许。

“长期以来，抗战题材的创作一直是我国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热点课题和新的生长点，那些最优秀的作品经过时间的检验之后已经家喻户晓，并载入史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有少数“神剧”令人倒胃口，但从整体来说抗战题材创作继续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

与此同时，李准认为，与抗战暨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历史本身相对照，与当今反对军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复活的需要相比，与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文化需求相比，抗战题材创作还需要继续作出多方面的开拓。

著名导演高希希则指出，我国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影视剧在价值观引导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与世界同期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影视剧相比，在战争的反思和人性的挖掘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他认为，应该逐步从抗战转到反战的层面，加大对战争的反思，加大对反战思想的表达，从更深层次去揭露战争的残暴本质，从而唤起观众内心对国家与和平真正的热爱。

战争是一面镜子，历史是教科书。重温历史，无数进步的作家艺术家与祖国共存亡、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共进步，铸就了我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展望未来，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将担负起历史使命和责任，用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继续书写人民，记录时代，树立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文化旗帜。